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与亚洲构想

赵京兰

中文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批判性知识分子汪晖的学问主体化战略的评价和批评，展现改革开放以后在西化、世界化的浪潮里知识社会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苦恼。汪晖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针对美国霸权主义，试图对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地区里的中国地位问题，作出提示。现今的中国知识社会里新自由主义者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支持西化、世界化，还主张国家的弱化和市场、市民社会的强化。汪晖面对这些人，积极肯定了国家的作用，从平等主义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问题点进行批评，他是“新左派”的代表性学者。汪晖将毛泽东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经验规定为从清朝末期知识分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他既肯定了西方文明占主导并且扩散开来的现代性的肯定性方面，又批评西方的霸权主义属性，摸索出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在国家的设计之下发展了市场和市民社会，于是根据国家/市场、国家/市民社会等二分法，主张弱化国家、强化市场和市民社会，认为这才是进步。汪晖则认为他们的主张是非现实的，在亚洲地区的连带、协作方案里，又觉得有必要对前民族国家时代亚洲地区的国际世界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重新作出肯定的解释。本文既高度评价汪晖复合性思维的深度和现实性，又批评他对政治民主主义相对的不关注以及国家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

关键词：汪晖，现代性，市民社会论，亚洲构想，国家，市场

一、绪论：现代性话语与学问的本土化

本文想将目前被评为“新左派”^①核心人物的中国少壮学者汪晖的现代性^②话语视为“学问的本土化战略”的中国事例。汪晖的现代性话语主要是从以对现代性的哲学角度看待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其间进行的亚洲论意图出发的。当然这一角度甚至扩大到了为现代性提供思想原则的西方近现代思想，汪晖的现代性省察主要是与新自由主义这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西欧中心主义的对抗，并试图以此来复原或提出中国的道路。具体的正如汪晖自己所阐述的：“现代性的省察并非对整个现代人生过程的否定，更不是全面抛弃现代价值”，“而是为广泛的民主主义与健全的自由提供理论资源。”^③他的现代性话语历史性地看待了中国近现代史乃至西方近现代，这一点上来看，与全盘否定中国革命遗产、绝对肯定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者不同。^④

汪晖将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与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视线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新亚洲想象中去，他的亚洲论与韩国左派的东亚论在具体的审级与范围上表现出不少的差异，但从其将亚洲话语的意义放在对资本主义和西欧中心主义的抵抗及亚洲的肯定性联合上这一点来看，体现了东亚式的问题意识。

① 这一名称是在“新左派自由主义争论”之后形成的，汪晖对此并不满意，他反而认为应该被称为“批判性知识分子”。但在中国知识界中，与老左派相区分的“新左派”这一名称已经普及，为了避免混乱，本文也予以沿用。

② 在中国，一般将 modernity 译为“现代（性）”，将 postmodernity 译为“后现代（性）”。

③ 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0—41 页（目前三印出版社已出版该书译文，但本文撰写时译文尚未出版）。

④ 正如新左派内部显示出极大的偏差一样，对自由主义派也难以进行单一的评价。对于西方现代性采取毫无批判的态度在新自由主义者中也属于右派。

汪晖的现代性批判是与中国学术史传统的重新发掘与重新确立的庞大作业同时进行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处于对中国传统的自我理解基础之上。^①从这一点上来说，“新左派”一方面从现代欧美左翼知识界原典中采用了一些理论资源，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情感在其思想深处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实际上，语冰评价认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问题，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时代及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基本评价”^②，在新左派中，这一评价对汪晖是最恰当的。

但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汪晖的中国现代性批判的确是以多种多样的西欧理论为依据展开的。他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和基本立场是采用了哈伯马斯（J. Habermas）与福柯（M. P. Foucault）的理论，对于全球化采用了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与布罗代尔（F. Braudel）的理论，对于国家、市场及社会采取了博兰尼（K. polanyi）的理论。但在采用方法上，正如中国历代思想家所表现出的那样，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有选择性的。^③从这一点上，我想把汪晖的现代性批判话语看作中国学问主体化战略的一个事例。

因此称之为主体化学问时所说的“主体化”与试图只依靠中国的传统来设计人类未来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和亚洲价值论者所说的“主体化”不同，与梦想体现出中华性、成为新的中心的所谓“后现代学者群”所说的“主体化”也不同。此外，与最近追求学问本土化的一群知识分子——与前面两个流派相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感情上的亲密——也略有不同。“本土化派”^④认为目前中国的

① 2004 年 7 月，他出版了题为《中国思想的兴起》的 4 卷全集，探讨了从宋代到最近的思想，在这里，汪晖试图对传统进行发掘、解释和重新解释。

② 语冰，《知识界的分裂与整合（代前言）》，《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页。

③ 我认为这是汪晖在研究 19 世纪末、20 世纪的思想家时自然而然地悟出的叙述收容方式。严复、梁启超、鲁迅、章炳麟等中国所谓典型期的思想家们试图实现的中国近代企划从学问主体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无法单纯评论为某一方面的深层。

④ 此处的“本土化派”为作者随意起的名称，意为主张本土化。

学术界在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甚至讨论主体等方面都被发源于西方的东西所笼罩着，对这种学问形态持批判态度。^①但汪晖似乎认为，在东西学术传统的相互渗透有很大进展的情况下，只要对历史的有效解析目的意识明确，不一定非要区分其发源地。

前面说明的学派由于具有其间受西欧压迫的郁愤意识，因此坚持着不惜令中国重新成为中心来强迫他者的事态到来的态度。因而可以说，在汪晖的学问主体化战略中，至少有怀疑他们平面性“主体化”的“目的意识性”。也就是说，是否定“主体化”的“主体化”。在这里，如果加上对于完全肯定现代性、并将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视为“封建”的多数新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在内，用汪晖的话来说，汪晖的学问思想战略可以说是“反主体化的主体化”。而且这一战略与他试图摆脱西欧与中国、现代与传统二分法的一贯意图是一脉相承的。

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思想界将现代性本身当作未来的目标并持肯定倾向，因此对现代性提出质疑就意味着提倡返回旧时代或是文化大革命时代，十分容易受到怀疑。^②中国的社会气氛本身不利于现代性批判论主体，因此对现代性的省察话语也具有不少思想和现实方面的负担。

第一，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以文化大革命为终结，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形象化为文革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来说，在记忆中，左就意味着经济平均主义，因此难以获得说服力。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新左还是老左，左总是难以被认识为进步。第二，无论如何，由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没落，社会主义巨大话语在很多方面暴露出其错误，中国人亲身体验了这一巨大话语实现的社会主义，这一记忆仍然构成现在的很多部分。尤其现在 50 岁以上的人中有很多是在文革中经历了种种痛苦的知识分子，从他们的眼光来看，对现代性的评价无法自由。第三，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现代性的批判话语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虽然不积极，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批判却是积极的。尤其是“新左派”是要实现经济民

①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思潮》，228 页。

② 汪晖，《现代性问题问答》，《死火重温》，8 页。

主的主体，并不排除国家，因此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批判一开始就无法具有力度，具有原则性的局限性。

曾将自己归类为“新左派”的哲学家甘阳在一篇论文中很好地指出了这种整体气氛：“大陆曾长期是一个‘极左’的社会，中国的改革更是以‘反左’为出发点，因此，在大陆‘左’是绝对的贬义词，‘反左’则具有最高的道德正当性。”^①也就是说，他认为表现为自由主义的“反左”被认为在政治上批判旧社会主义政权，在经济上表现为追求“发展”的形象，因此被评价过高，与此相反，“新左派”则被评价过低。

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注意到了汪晖并将其作为学问主体化战略实例，其原因在于，从宏观来看，首先，他摆脱了西欧式的认识框架，试图使其相对化，进而带着独立的思考框架来分析中国。虽然他这种努力尚未到达理论阶段，但已经摆脱了概念的从属阶段，可以说正在入门。尽管本文在结论中指出了几个问题，但对于开始对学问的概念从属怀有问题意识的韩国学界来说，他的方法和精神方面有不少的参考价值。

二、90 年代思想界的分化与汪晖的思想位置

首先，为了了解汪晖是什么样的人，在思想界所处的地位如何，有必要了解一下改革开放以后 80 至 90 年代的思想气氛和“新左派”的抬头背景。8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之为新启蒙主义。这一时期表现为启蒙主义是与李泽厚“在中国近现代时期，由于需要救国，使得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启

①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0—111 页。甘阳认为包括汪晖在内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是从自由派的思想分化中衍生出来的，主张将其（与自由左派相对比）称为“自由左派”。对此，汪晖认为甘阳将自己称为自由左派是为了与官方左派区分开来。（2004 年 2 月 17 日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时论及）

蒙被暗中放弃”的问题意识相通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后，80年代在新启蒙主义旗帜下，自由派知识分子得以发出呼声，而正在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也并不讨厌这种呼声。因此汪晖评价说，新启蒙主义为整个国家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在这里，提供新启蒙主义思想资源的是法国初期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其实新启蒙主义者是想利用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来批判中国社会主义的“封建性”。^①可以说，新启蒙主义像“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一样，尽管并非毫无问题，但还是在中国社会起到了改革作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改革性渐渐褪色了，主张新启蒙主义的改革派自由主义思想阵营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为分水岭迎来了第一次分化。随着阶级利害关系的不同，在这一事件中的要求和对此的解释十分复杂。1992年，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契机，天安门事件以后稍有停顿的开放速度再次加快，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更加深入，贫富悬殊的扩大和社会福利体制的崩溃等社会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9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在对这种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一次思想分化。对此，汪晖曾说过，广泛的思想分化的现实动机存在于改革本身是利益分配的过程这一事实当中。比如，他认为知识分子也作为改革时代的受惠阶级与国家、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高科技部门、舆论等行业完全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一阶层与工人、农民阶级的历史联系却完全断绝了。^②

汪晖评价说，伴随着思想分化，80年代新启蒙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潜力也在

① 对此，汪晖对新启蒙主义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等同于封建主义历史并对其进行批判这一点产生了怀疑，并且批判说，中国在引用尼采和萨特的观点时，也去掉了这些思想家表现出的对西欧现代性的批判，只把其作为个人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象征来接受。

② 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新亚洲想象》，创批，2003，165—166页。思想分化的结果使多数知识分子支持通过加强资本主义开放的方法进行改革，但与此相比，一部分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后从倾向来看，前者被归类为“自由主义派”，后者被归类为“新左派”。

编入现代化意识形态框架的过程中丧失了活力。在思想上，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相信西欧的现代化之路，认为这一期待来自于毫不怀疑地接受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概念和普遍主义立场。但其之所以能够对新自由主义者坚信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是因为经历了前面所说的新启蒙主义分化过程。

首先开始对西欧普遍主义产生怀疑的是一种主张儒教资本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的主张可以表达为以儒教替代新教，即所谓的“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儒教原理来发展资本主义，提出的证据是“亚洲四小龙”，他们将儒教视为另一种近代化意识形态，这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的绝对肯定逻辑。在思想方面，后现代学者群的主张巩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特有的中西二元对立话语模式。在中西二元对立结构中，他们关心的主要在于中国能否重新回归中心以及中华性的建立。换言之，中国的后现代学者群根本没有进行脱现代主义者普遍进行的站在周边的立场来对中心进行批判的工作。汪晖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被束缚在了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版图中，如同失去了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的力量，这两大类的结果是类似的，即认为相信他们也无法批判性地介入中国在资本主义深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的共同点是，从现代性的目的论角度，对全球化持着十分肯定的态度。例如，将全球化视为超越大同的实现，是通往康德主张的永久和平的思想之路。

对此，汪晖注意到了一群主要从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中受到刺激，试图提倡中国的新制度与理论探索的年轻学者。他们对资本的评价中，不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而是试图将其当作分析现实的工具。他们主张的核心是试图以经济民主为关键字来看待一切问题，汪晖认为这一问题意识很符合目前的中国社会。

^①在汪晖看来，他们的思想驾驭方式超越了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结构来思考中国问题的启蒙主义思维模式，评价他们超越了要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中选择其一的二分法，正在探索创造出新制度。汪晖认为，在中国社会中，

^①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新亚细亚想象》，创批，2003，77页。

经济民主化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及生产方式相关，因此不可避免地必然要与政治民主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一立场，汪晖将他们视为介入正在经历快速的现代化过程的中国变化现状并能提出问题的为数不多的少壮学者群。出于便利考虑，若将包括他们在内的对“发展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广泛学者群称为“新左派”，那么与自由主义者相比，他们在中国学界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在他们当中，汪晖正在展开比任何人都活跃的超群学术活动，因此他在学界所占的位置也可以说是非同一般的。

三、现代知识与中国现代性解构

汪晖认为，首先，中国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批判若不与西方现代性省察联系起来便毫无意义。在西方思想史中，对纳粹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若不与对整个现代性问题的思维联系在一起，无异于会变成成为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辩护，会掩盖独裁的真正根源，掩盖殖民主义历史与现代的遗产，这是同样道理。^①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批判若无法发展为对西方现代性的省察，它的确不仅无法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而且甚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分析，这一指出是正确的。

在这种认识下，汪晖相信，对现代性的省察可视为对现代性知识的检讨与对现代社会过程的探索，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他认为时间观念是现代知识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形成现代知识纲要的这一观念是直线前进、永不反复的历史时间观念，其起源为基督教的末日论世界观。众所周知，在哲学上最好地体现出这一观念的是黑格尔（G.W.F.Hegel）。在黑格尔的作用下，以时间观念为内容的现代性观念成为时代观念。随后 15 世纪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不知不觉成为区分现代与中世的里程碑，无法逆转的目的论时间观为我们提

①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死火重温》，107 页。

供了对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要求我们朝着未来的目标前进。他还认为，若没有这种目的论世界观，实际上的生活和学习便无法实现。但以这种世界观为根据的现代性成为巨大叙事，这一巨大叙事与权力相勾结，带有垄断性和强制性。结果这一世界观虽然扩大了自由、解放了人类，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权力关系。这一权力关系导致了压迫，也就是说，解放和压迫共存于现代性之中。^①

如上所述，这一巨大叙事是一种世界认识的框架，没有它，也许我们的现实生活也会变为不可能。因此问题汇集为应如何理解和应对现代性的危机。在这里，哈伯马斯的登场变得十分必要。哈伯马斯说“未完成的企划”是为了与现代的企划及历史过程区别开来。哈伯马斯认为，实际的过程是由对企划的歪曲、排挤及压迫的过程。换言之，理性压倒了一切，覆盖了生活的整个领域。哈伯马斯承认现代性的价值，同时对现代性过程本身又持批判态度。

汪晖高度评价哈伯马斯将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区分开的做法，比如，他认为哈伯马斯将现代性看作某种先验性的定义，不是追求它，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历史性产物，认为应该研究其进步作用如何在现代世界的历史关系中转换为压迫形式的，因为解放与限制存在于一个变动的过程之中。

汪晖从这种对现代性持双重态度的观点出发来说明其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思想家们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与评价十分多样，严复是将现代性概念介绍到中国的元凶，但正如其将进化论翻译为《天演论》^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认为现代性概念中含有进化与循环、运动与静止的矛盾。^③章太炎曾在《俱分进化论》中批判了进化论和目的论的历史观，鲁迅也曾在《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中分别批判了现代性，并指出“应赶走伪善的知识分子，保存迷信”。孙文的民生主义中含有为如何避开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并使其现代化的苦恼，从这一点来看，蕴含着对现代性具有强烈的批判视角。汪晖评价认为，大多数清末国民初期

① 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死火重温》，4—5页。

② 《天演论》是T.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的译文。

③ 具体的相关内容请参考汪晖的《严复和三个世界》（《学人》第12期）。

思想家都是以现代为基础对现代展开的批判。从中国的轨迹来看，现代性批判若不无视实际的历史方面，就只能这样矛盾而又统一。

但汪晖也指出，多数中国现代思想家采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来讨论现代性问题的。与现代性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新青年》和《新潮》杂志来对中国进行改革。这里的“新”字表达的就是现代性。

^①此外，五四前后柏格森的创造性进化论传入中国，这是原来的历史、政治、经济进化概念发展到了精神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将历史视为目的论的，并认为它是受道德引导的。之后马克思主义很快传入，批判各种资本主义，也同样以“新”自居，并相信历史和进步朝着固定的未来发展。尽管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性，但它仍然处于现代性的范畴之内，因为它也是在历史目的论逻辑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的自我。^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将其接受为总体价值，试图使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将目的论世界观基础磁化了。

与此相关，汪晖将中国社会主义定义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同时也是清末以后中国思想的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此外，他认为前面所说的清末思想家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能避开现代性的弊端而苦恼，因此他们对现代性的怀疑与批判本身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最基本的特征。^③

① 之后参加过《学术》和《甲寅》的知识分子站在保守主义立场批判了参加《新青年》和《新潮》的知识分子的进步观。但他们的批判也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从这一点上来说，问题意识是相同的。（汪晖，《现代性问题问答》，9页。）

② 汪晖，《现代性问题问答》，9页。

③ 汪晖，《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87页。

可以认为，在中国的历史状况下，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暴露出严重的历史矛盾，汪晖认为，毛泽东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制度，同时又对这一制度本身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坏，在这一过程中，在国家的目标下组织整个社会，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但毛泽东对于国家机构压迫人民主权带有极大的反感，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反现代性的性质。他认为这种自我矛盾虽然起源于文化背景，但更重要的是由中国现代化运动所处的双重历史状况引起的。^①汪晖认为应该站在这种立场上认识中国革命的意义。

汪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主义虽然含有对现代性反思的意义，但它毕竟还是被束缚在现代性的框架之内。此外，汪晖也承认，作为现代性主要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对社会组织的压迫，尤其是国家对个人的压迫比资本主义更严重，^②因此他认为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现代性内存的危机。汪晖的这种分析出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启蒙主义无法适时地介入中国目前社会变化的判断。汪晖认为，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中国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进行历史分析是有价值的。

四、现代性的反省与自由主义市民社会论的遗憾

汪晖在 1997 年以后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的争论焦点在于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他在这里提出的平等和公正中，与理论上的先验性前提意义相比，更蕴含着国家和一部分集团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判意义。现在中国左与右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民主问题的理解。左派强调认为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运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结构来考虑，社会变革的任务也是一种民族参与机制。相反，右派在理论上强调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自生性，强调这两个领域的非政治性，将对

^①汪晖，《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48-49 页。

^②汪晖，《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86 页。

自由的要求置于对民主的要求之上。但汪晖认为有没有政治自由的实质性内容才是问题的核心。^①在这里，政治自由的实质性内容意味着经济自由的保障。

因此汪晖明确认为，暴露和批判在改革过程中利用“过渡期”和“发展”等观念来密封起自我矛盾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本质才是中国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任务。如上所述，他分析认为，中国新启蒙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没有发展成为对资本主义的省察，因此在中国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没有做出正确的应对。这一点正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形成起源相关联的，所谓“新左派”自由主义者之争正是由汪晖的这种问题意识引起的。

汪晖与自由主义者之间争论的核心是对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解释以及如何看待国家、市场与社会的问题。汪晖认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其失败的结果中隐藏着新自由主义的起源。首先他将 1989 年天安门事件评价为，以知识分子学生为中心表现出的“与开放相匹配的政治改革要求”，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阶层（除农民外）参与的“社会民主与平等要求”共存的运动。^②自由主义者相对更关心前者，相反，汪晖则关心后者。汪晖将后者解释为对改革过程本身的要求，将其视为在改革过程中对市场扩张过程带有批判性视角的社会保护运动。

在参与 1989 年社会运动的阶层中，有几个利益集团在权利与利益转让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但对于 1989 年社会运动之后立即开始的调整政策怀有不满，试图迫使国家采取更加激进的私有化政策。他们试图通过行贿等手段使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朝着有利于自己集团的方向转换，在一部分与国家权力结下关系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汪晖将此视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形成。^③

① 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164—165 页。

② 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94—95 页。

③ 汪晖分析认为这一运动失败的间接原因在于没有能力在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对平等的要求之间架设桥梁，认为这与自由主义形成的起源也有关。

因此自由主义者与汪晖提出的对国家、市场及社会的展望必然存在着差异。汪晖首先引用卡尔·博兰尼的主张，认为西方19世纪资本主义也可能不是中世之后持续的市场活动扩散的自然结果，^①而是与社会、市场、个人、国家一样，是科学企划的结果。^②博兰尼认为，自由市场依存于国家的计划，国家对市场的限制反而必然会自然产生。即认为自由放任是缜密计划的结果，计划经济是自然产生的。大部分人反对国家的干涉，却又无法理解其干涉的必要产生于市场活动内部这一事实。汪晖认为博兰尼的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他相信，若想清算计划经济的罪过，就需要检讨计划经济模式产生于自由市场内部矛盾的漫长历史过程。^③

汪晖以博兰尼的这种主张为基础解释说，市场经济是在19世纪出现资本主义体制的全球化这一动向中，通过清朝的制度措施创造出来的。同时认为，清朝政府对市场的干涉既是现代国家的起源，也是市场社会的起源。^④近代欧洲的社会思想是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同时扩张中产生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⑤因此，仅用个人的政治或经济动机无法说明清末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他认为在近代社会的改革中，社会与市场都应看作是所有国家直接推行的制度产物。^⑥

因此汪晖认为社会与市场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国家的企划和干涉形成的，因而无法成为自主的或自律的范畴。所以在清末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一直不是主要社会问题。其证据是，在清末的思想中，公与群的概念既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社会，加强国家的力量与加强社会的力量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汪晖分析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在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中，

①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35页。

②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00页。

③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44页。

④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46页。

⑤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47页。

⑥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50页。

带有适应国际经济秩序与政治体制的基本目标。^①

汪晖试图以上面对清末的这种分析为依据来理解中国的现在。即，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始终与国家存在联系在一起，并且是在国家的推动中形成的。因此对于“市民社会”是否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处于社会与国家这一两极结构的中间提出了疑问。^②比如，在提到公共领域，即社会性、政治性批判社会问题的形成时，他以最近被评为中国思想解放象征的杂志《读书》（汪晖主编）为例进行了说明。《读书》虽然是隶属于国家的出版物，但这一内部刊物却比民间刊物更能提出大胆的意见。汪晖认为这种颠倒的现象说明了中国公共领域的模棱两可，同时也体现出，这一公共领域并没有抵抗国家政治干涉的真正力量。^③这说明了利用哈伯马斯所说的欧洲社会公共领域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具有局限性。

汪晖主张，现在中国的市场和社会也是在国家的意图之下创造出来的，而且国家已经成为市场社会的内部因素，因此不能用国家与市场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来看待双方的关系。立足于此，汪晖断定，中国政府的弱化与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并不能发展为市民权利的扩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反而起到了将地方政府变成利益团体的反作用，以权谋私与腐败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权力下放的结果是，中央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国家的调节能力也被削弱，因此到了女性、儿童、老人等的福利受到威胁的地步。因此他认为国家不能无限地变小，自由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只要国家缩小，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对事实关系的误会引起的。^④

①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52—153页。

② 汪晖，《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80页。

③ 汪晖，《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80—82页。

④ 将汪晖的主张与自由主义派学界中最活跃的秦晖相比，其意义就会变得更为明确。秦晖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起码要在以实施立宪政治和实现公民社会的前提下才可能。即，他认为应该讨论一下，实施立宪政治以后权责变大的国家好，还是权责小的国家好。他认为现在的国家并非立宪政治国家（而是专制国家，因此）社会也并非公民社会。因此认为

汪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结构可以复制到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中，不够发达的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民主化的困难可能因此而加重。正因为此，他回到了王绍光提出的问题，即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在这里，强有力不仅指狭义的国家财政能力，而且意味着国家正当性的基础。只有在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之上的立宪政治民主国家，对内人权才会受尊重，对外才能抵抗霸权。^①

关于大众民主，汪晖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中间层的范畴与作用。首先，他对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普遍”市民社会论的中产层概念表示遗憾，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的主要力量中间阶层应该是工人阶级。如果中产层的概念以排斥工人阶级为前提，即将原有的大多数工人、农民阶级排除在中产层之外，那么决不能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民主。^②

与此相关，他又反问，在中国，“全体”到底是意味着谁？汪晖警惕地提出，在中国排除了大多数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也可能会提供社会不平等的理论根据。因此他主张即使谈论到市民社会，也应该顺应中国的特殊社会发展过程，这样市民社会的问题最终只能与发展的模式联系到一起。在这一支点，汪晖的市民社会论与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与试图坚守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哈伯马斯也产生了差异。汪晖最终相信，应该以符合中国实情的研究为基础来完成市民社会的概念定义。

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适用于中国很勉强。（赵京兰，《当今中国五位知性人的市民社会论分析》，《哲学与现实》，2004年9月）这两个人虽然都对利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表现出抗拒，但抗拒的原因各不相同。

①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9页。

② 与此相反，秦晖认为，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那么民主便不会打下坚实基础，因此他们虽然是公民社会的原因和结果，但并不是他们争取的民主。民主在西方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是由与一般的资产阶级相区别的社会大众（中国的情形是受国家保护较少的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作用下获得的。（请参见前面赵京兰的文章）。

五、现代性话语与亚洲构想

汪晖的现代性批判是对西欧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对抗，同时其目的在于在话语上为中国提供出路。那么对于他来说，亚洲话语的位置在哪里？他的亚洲构想与现代性话语又是什么关系？汪晖说新亚洲想象的目的在于对全球市场计划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双重批判。也就是说，他的新亚洲想象目的既非全球主义，亦非民族主义。但他也直视“这一发言是理所当然的层次上的表明，理所当然与现实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一事实。因此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他的亚洲构想完全是站在中国这一国家角度的探讨，他自己也曾阐明过，其重点在于中国的崛起。

汪晖的亚洲构想的核心在于对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但亚洲实现共同抵抗的条件与欧洲不同，难以实现。他的亚洲构想坚持追究之前亚洲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的原因正在于此。如何处理民族国家的位置、亚洲的殖民主义亚洲观与社会革命亚洲观的问题、殖民与冷战的结果处理问题、大陆与海洋关系的处理问题，在超民族构想中，如何处理近代之前的帝国或朝贡关系以及近代之后他们的关系问题等，举出这些具体的课题，亚洲问题绝不乐观。

作为亚洲想象的典范，汪晖注意到了欧洲社会关于脱离民族主义的言论。他认为欧盟不仅仅停留于经济联合，而是扩大为政治企划，这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现象，认为这种政治共同体起源于对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与困境的反省，^①欧洲构想正是与美国霸权针锋相对的，它摆脱了保护性计划。^②汪晖认为亚洲也应该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相抵抗，这一抵抗仅靠经济联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单纯靠市场的经济联合来应对反而只会起到保障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更加多样、丰富、更加持久的作用，必须有政治共同体的构想才能具有保护性质。但这个亚洲并不像欧洲那样由在经济、政治上均等的国家群构成的，这

① 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想象新亚洲》，创批，2003，178页。

② 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177页。

些条件是使具有现实性的亚洲想象变得渺茫的原因。

汪晖认为，反而可以从对前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朝贡体制新的解释中寻找亚洲想象的现实性，他认为这一朝贡体制与现在的新帝国形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汪晖试图将朝贡体制解释为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为基础的平等主义复合体，因此他感觉到，对于朝贡体制，有必要对其间学界形成的狭隘理解进行纠正，同时试图发掘站在笼统而又平均主义的立场上思考亚洲的思想家。前者有滨下武志、沟口雄三等，他们是以内在发展论为根据，从“脱离欧洲”的视角展开的亚洲论。后者的代表则为孙文，以汪晖看来，孙文的“大亚洲主义”是中国人能提出的不多见的亚洲论，^①对朝贡关系的解释也含有亚洲普遍性。

首先，滨下武治认为在经济史领域中，中国以朝贡关系为媒介，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存在着以海洋为中心的、与西方的贸易体制不同的、作为另一个世界体制的亚洲。他不仅认为朝贡关系并不影响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制，而且还将其视为亚洲概念的基础。在这里，朝贡贸易体制被说明为中心与周边的框架。汪晖最欣赏滨下武治的是，他挑战了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体制理论中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承认日本与亚洲的历史关系，批判了现有日本学界的脱离亚洲论与特殊论。但汪晖对滨下武治将分为中心与周边的框架、并且局限于经济关系来看待朝贡贸易体制这一点提出了最大的质疑，例如，他强烈反驳说，用中心与周边的框架无法解释朝贡贸易体制，中心与周边不断的滑动才是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区别的朝贡贸易体制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于滨下试图将之只视为经济关系，汪晖反驳认为其具有政治、文化、礼等复杂的性

① 传统时代的亚洲即为中华帝国体制，因此中国不必非要通过亚洲来确认自己的本质特征，因此对亚洲论并不感兴趣。相反，日本的亚洲论很多，是因为在 19 世纪末中国帝国体制崩溃，日本作为中心重新编入亚洲秩序的过程中，日本有意成为亚洲新的中心国有着密切关联。朝鲜与此不同，以小中华自居。在这种现象的背景中，有着朝贡关系本身含有的中华思想的变貌。（郑庸和，《从周边看朝贡体制》，《东亚地区版图：历史的延续与断绝》，太平洋共同基金研究小组发表会），2004，43 页。

质。^①

沟口雄三认为东亚的近代化过程与文化的传播过程有着内在联系，其中有着与欧洲相区别的文化原理。他解释说，与欧洲不同，在东亚有与合理主义的宇宙观和法制相比更强调德制的朱子学，它以乡村地主制为基础，传至 11 世纪的宋朝、14 世纪的朝鲜、17 世纪的江户时代，成为进入近世的出发点。在这里，沟口雄三试图将朱子学和阳明学说明为现代思想的起源，这是认为以天理观念为核心的朱子学的衰退并非现代发生的前提条件的观点。

这一强调传统与现代延续性的说明框架还解释说，三民主义的平等主义因素是建立在传统的公概念基础之上。对此，汪晖认为，沟口雄三利用文化原理来说明亚洲，是对世界体制论未能突出的文化意义给予了重视，因而值得倾听，^②评价说中国的近代变化与伦理世界密切相关也是沟口雄三的独到见解。但在汪晖看来，天理世界观和公观念经历了历史变化，因此只从观念的层次上难以说明。此外，天理观既可成为反对等级制的逻辑，也可以成为拥护等级制的逻辑。同时，沟口雄三所指的亚洲实际是东亚，与包括中国儒教文化在内的亚洲和以朝贡网络（尤其是海洋朝贡网络）为媒介的亚洲复合体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从汪晖的角度来看前面所说的两位学者的视角，将亚洲贸易体制与思想史解释为内部发展的含义，并非从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单纯地转换为日本或韩国的一国民族国家历史，而是意味着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帝国体制一朝贡关系网内来看待的。在这里，超越民族国家的亚洲视角一方面是对各自民族国家地位的肯定，同时也与传统帝国体制的肯定相重叠。但这一肯定是以传统帝国体制以中心和周边的关系为历史运动轴心这一点为前提的。^③

① 汪晖更严密地对滨下武志试图以海洋贸易关系为中心来进行说明朝贡关系中的贸易提出了怀疑。汪晖还认为清朝具有帝国和国家的双重性质，提出的证据是，与朝贡一起，还缔结了条约。也就是说，汪晖主张在 19 世纪朝贡体制与国家体制已经具有复合性的关系。

② 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213 页。

③ 汪晖，《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7 页。

但在汪晖看来，按照这一观点来看，他们全都带有这样的视角：认为自律性的东亚世界概念，即东亚世界作为一个自我完成性质的文化圈，其中多样的文化既是独立的，又具有相互关联的历史结构，因此便会得出“亚洲地区近代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企划并非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而是亚洲社会内部中心与周边关系的结果”这一结论。

汪晖认为，亚洲概念是由于与欧洲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因此亚洲话语也应该在全球的联系中，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与实践共同展开。并认为排除前面所说的以资本、战争、殖民地、革命和民族主义等为内容的亚洲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的亚洲论只是虚构。作为满足这些条件的亚洲构想，他注意到了前面提到的孙文。但在这之前，他首先也注意到了列宁的亚洲认识。因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革命也不是亚洲的特殊命运，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运动。^①汪晖解释认为，这一主张指出了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

汪晖认为孙文的亚洲观并非以同质文化为基础的亚洲观，而是构成平等的民族国家的亚洲概念，因此亚洲内在的统一性并非儒教那样的单一文化，而是可以由能够包容互不相同的宗教、信仰、民族、社会的政治文化构成。日本和中国在这一范畴内被提及。汪晖将“大亚洲主义”解释为对高度同质化的东亚概念提出的严重批判。此外，他认为“大亚洲主义”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和超越文化单一性的民族主义，从这一点上来看，“大亚洲主义”与国际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依此来看，孙文既非帝国主义者，也非种族主义者。而且孙文在提到朝贡模式时（尼泊尔），呼吁的目的并非为了确认中国对周边的霸权，而是为了论证王道的必要性。孙文确信，朝贡模式中包含着相互承认的平等关系。不仅如此，在汪晖看来，孙文试图对外实行民族自决，对内实行民族平等，并评价认为他以此来构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方式。^②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511—512页。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186—187页再引用。

② 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187—192页。

在孙文的亚洲构想中，汪晖瞩目的是，孙文提出了一个不仅仅是经济性的，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性的亚洲概念。在这里，亚洲构想的核心在于，与亚洲的文化相比，认识亚洲复杂的殖民主义历史。这些概念在汪晖的现代性批判及东亚构想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也是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衍生过程中发生的。

那么汪晖想通过对孙文“大亚洲主义”的重新解释来说明什么呢？他似乎认为按照孙文所说的，只有在尊重平等主权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形态的合作关系保护性质的制度框架与共同统治的社会框架，想提出之前的朝贡关系就可以成为其典范。^①出于这一目的，汪晖强调：“现代中国的内外关系其实是继承了前民族国家时代的遗产，即朝贡体制的平等主义遗产，并根据主权国家模式对这些遗产进行了改造。”继而 he 似乎认为：“在民族国家成为一种主导政治框架的条件下，亚洲传统的各种交流共存的经验与制度形式能够提供超越民族国家体制带来的内外困境的条件？”半带反问地表示了强烈的肯定。这一肯定又再在汪晖身上重新确认为，传统的朝贡体制具有美国“没有外部的帝国”和日本作为国家扩张的“大东亚共荣圈”无法比拟的道德优越性。

对这种以道德性为基础的“公正”帝国的坚信使汪晖对将中国这一国民国家单位作为省察对象产生了犹豫，同时产生了亚洲想象无法摆脱民族国家想象的感觉。汪晖再次提出，我们所在的亚洲世界正在被卷入比任何一个地方都汹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一浪潮之中，而且韩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地的亚洲地域主权建立过程尚未完成，想再次强调这一点。这大概是汪晖的市民社会论中与强烈的国家主张一脉相承的部分，但它也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真实现实，并只有直视它，才能得出摆脱亚洲想象的虚构性与困境的替代方案。汪晖的问题意识在于，若没有对东亚所处现实的真实的“绝望”认识阶段，很难实现我们所希望的亚洲联合。

① 欧洲的政治共同体虽然是汪晖思考的亚洲政治共同体的理想模式，但他也提出了历史、现实条件的不充分来说明在亚洲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像欧洲那样的政治共同体，重新进行了否定。

六、结束语：现代性话语的意义与疑问

问题在于，至今为止探讨的汪晖的战略对于目前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正处于转换期的中国是否适合和富有实践性。这一点正如前面所探讨的那样，在他的核心主张中，含有无法仅仅视为人文学想象的、对于中国前途的宏观性展望。但正如绪论中所预告的那样，在汪晖的现代性话语中也有不少不亚于其意义的、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部分，尤其是对于国家和亚洲的构想中更是如此，这二者形成因果关系。

第一，与汪晖本人的意图无关，他对市民社会的立场可能会给人留下未能将国家对象化的印象。^①为什么会显得这样呢？这大概与他的市民社会论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国家意愿不无关系。但坚持对现代性的反省这一立场的汪晖在原则上不可能不懂得国民国家强烈的权力（暴力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国家的视角中有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是在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国家，也就是说，应该看是否具有与普通资本主义国家毫无差别的国家系统。另一个是应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阶段处于何种水平，这些是可能限制知识分子整体思考的因素。在汪晖的思考中蕴含着这样的判断，市场与地方政府只顾自己的利害关系，对此进行调整的市民社会团体尚未组织起来，从这些情况来看，最终负责占国民70—80%的农民的生存问题的主体迫不得已只能是国家。

尽管如此，汪晖若不想被误会为自己对国家的批判太弱，在主张经济民主时，需要对如何确保政治民主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因为若政治民主无法得到保障，经济民主可能会同时伴随着国家机构对人民主权的压迫。从这一点上，对于周蕾所指出的可能会导致“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并为人民代言是对

^① 这似乎并非仅仅限于汪晖这样的新左派，因为如果说新左派对国家的政治批判较弱，那么汪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方面对国家的批判也很弱。倒过来也可以说，两者在对国家的批判中分担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引自赵京兰、康真雅对话，《对中国市民社会的人文学展望》，《韩国，谈亚洲市民社会》，Arche, 2005, 201页，作者的发言。

为国家献身的道德观念的重新确认，其结果往往是在历史上容忍权威主义国家”^①的结果，汪晖也要进行苦苦思索。

第二，与前面指出的有关，汪晖的思考只要与政治方面相关，就有可能遭到消极和不切实际的批判。对于全球化，汪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很多跨国资本的经营、国家霸权的形成等在相当程度上都依存于独裁政府。因此他也承认，批判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实际上也可能是国际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对于这一批判，他提出了“抗议自己所属的社会可能会带来否定效果，在开放过程中也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②的理由而予以保留。

他的这种立场听起来像是，汪晖自己承认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形成大部分依赖独裁政府，但同时又主张放弃对分业体制中断开世界体制之环的国内实践。只是，对此他主张，对于全球化过程的批判决不会削弱对国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批判，这种视角提供分析国内关系的必需条件。但对于全球化过程的牵制，若非对其独裁政府这一具体实现单位进行批判的夹攻战略，很难期待具有实际效果。因此正如绪论中所说的，对汪晖不友好的学界气氛只能会继续成为负担。

第三，汪晖的亚洲论与作为可以通过与我的非对称关系来改变我的契机的亚洲论看起来还有一定距离。这似乎起因于他的思考过于局限于中国国民国家的状况性认识。因此，作为亚洲想象的条件，他既不以对国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彻底批判为前提，也不要求这样。汪晖反而认为在现阶段应该强化国民国家，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亚洲想象完全“忠实于”中国的现实，而这一点又矛盾而又统一地使他的亚洲构想变得并非虚构。虽然汪晖的亚洲构想最终目的在于对全球化和民族的双重批判，但在现阶段像欧盟那样的亚洲共同体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为了抵抗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克服同样为西方近代产物的民族和国民国家并非当务之急。因为在中国的立场上，这比对民族与国家的批判、解体之后即将到来的

① 周蕾（张秀赫、金禹英译），《教育、信赖——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流离的知识分子》，移山，127页。

② 2004年2月17日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

阶段的幻想相比，保持现状更加现实得多。

但同时，这种设想与没有中国与亚洲区分意识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习惯也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认为中国不以亚洲为媒介，也可以具有亚洲意识。这也许是“并非中国存在于亚洲之中，而是亚洲存在于中国之中”的中华帝国时期有根据的认识。这时中国的问题即为亚洲问题，这种构想其实与日本的脱亚意识构成硬币的两面。但正如孙歌指出的那样，亚洲问题在相当于文化大国的周边部、即“周边国家”的地方也许会存在真正的问题。^①当然，中国的亚洲认识是不可能与韩国的亚洲认识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正如韩国的亚洲认识并非自然获得的一样，中国的亚洲意识也并非自然获得的。与前近代的帝国时期不同，现在需要明确的亚洲与中国的区分意识。没有区分意识的亚洲构想有可能被误会为并非想将亚洲作为自我更新的契机，而是试图将其作为重新确认过去的自我的契机。从这一点上，站在流离的角度，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应解体中心意识的意见十分重要。若没有自我解体的意向，便难以拥有以他者为媒介进行自我否定的契机，没有自我否定的契机，也就难以获得抵抗的意义。

第四，若想将支持朝贡体制的中华秩序原理在 21 世纪也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方案提出，首先需要对此进行有深度的历史理解与协商。记住前近代时期“和平”的帝国体制并从中获取构想亚洲的某种教训的想法很重要，但没有对帝国体制进行客观分析，只是以主观的、肯定的自我解读为根据的亚洲想象是有问题的。

汪晖极力辩解说，孙文的“大亚洲主义”中所说的朝贡体制并非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而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下构想的民族之间的平等。但我们在这里既承认汪晖对歧视主义的批判意图，同时也不能不思索一下他为什么想借孙文来探讨普遍主义。通过孙文重新解释后的帝国普遍主义构想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帝国的抵抗，也是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批判，而且尚未满足形成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条

① 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亚洲这一思维空间》，创批，2003，61 页。

件。鉴于这一点，虽然并非不能理解，但对于不具备中国人本质特征的人来说，这有可能受到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论、可能是新的中心主义的再生产的批判。此外还有必要注意到，对孙文的解释也非常多样。韩国的某位孙文研究专家认为，孙文在其他文章中曾表示带有“中国将来若能成为超强大国，以前的朝贡国会重新服属于中国”的期待，也说过“为了保护中国不受日本侵略，可以将朝鲜作为缓冲国”。^①若上述言论属实，那么孙文在《大亚洲主义》中所说的王道和亚洲联合的真实性也可能令人产生怀疑。若想将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定论为“普遍主义”，至少需要对这些疑点进行明确的阐述。

但是，尽管有这些疑点，对于只经历过“朱子的朝鲜”和“马克思的韩国”，而未经历过“朝鲜的朱子”和“韩国的马克思”的韩国人来说，汪晖的战略还是有不少启示。因为汪晖看似过分的“中国式”问题意识是仍处于欧美中心学问框架，有出现中国事大主义征兆的韩国知识界迫切需要的学问态度。这是一个无法还原为“中国特殊性的范围相对较大，是韩国无法比较的问题”根本性问题。

（作者系韩国 延世大学 国学研究院 HK 研究教授）

投稿日：2010.4.16，审查日：2010.7.5-18，刊载决定日：2010.7.20

参考文献

- 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载《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汪晖，李旭渊外译，《想象新亚洲(새로운 아시아를 상상한다)》，创批，2003。
- 语冰，《知识界的分裂与整合（代前言）》，载《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载《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赵京兰，《当今中国五位知性人的市民社会论分析(현 중국지성 5 인의

① 裴景汉，《孙文的中华意识与韩国独立运动》，《历史批评》第46期，1999，141页。

시민사회론)》，载《哲学과现实》62，2004。

孙歌，柳浚弼外译，《亚洲这一思维空间 (아시아라는 사유공간)》，创批，2003。

裴景汉，《孙文의 中华意识和 韩国独立运动》，载《历史批评》第 46 期，1999。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sia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o, Keong Ran

This paper is to show Chinese knowledge society's concerns about Chinese socialism being proceeded with in the stream of west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a Chinese critical intellectual Wang Hu's subjectivation of scholarship strategy in a critical approach. Wang Hui, accep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ism to a degree, tries to reset the status of China to cope with American supre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articularly in the Asian region. At present Chinese knowledge society is dominated by neo-liberalists supporting west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sisting on the weak state and the strengthened market and civil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Wang Hui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in the "New Left" camp, optimiz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criticizing the problem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from the egalitarian perspective. He defines the experience of Mao's Chinese socialism as "anti-modern modernity" succeeded from the late Qing scholars. In other words, it's the result from criticizing Western supremacy and seeking for a different modernization from that in the West, while approving of the good side of modernity which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led and disseminated.

Wang Hui also points that in modern China where the market and civil society have developed under state planning, the neo-liberal argument in which weakening the sta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rket and civil society on the premise of state/market, state/civil society dichotomies is unrealistic. And regarding how to create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n region, he points to a need to positively reinterpret the Tributary System around China in the center, the pre-nation state world order. This paper, while highly acclaiming Wang Hui's depth of multi-dimensional thought and relevance, criticizes his relative disinterest in political democracy, state centrism and China centrism.

Key Words: WangHui, Moderniity,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Conceptualization of Asia, State, Markets